

# 侯马对中国戏曲史的贡献

□ 柴平林

山西侯马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主要贡献有三。一,第一部被翻译到西方的剧目《赵氏孤儿》,即 1775 年被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翻译成《中国孤儿》,在欧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侯马。二,侯马市金元时期砖雕墓中的戏曲内容,在研究中国戏曲史上有着从滥觞期到成熟期转变的意义。三,侯马是戏曲之乡,在这片沃土上早在金代就产生了以董解元为代表的戏曲作家。

元代取消了科举制度,给饱读诗书的秀才们编写杂剧腾出了大量的时间。既然是杂剧,一些以讹传讹的传说就有了用武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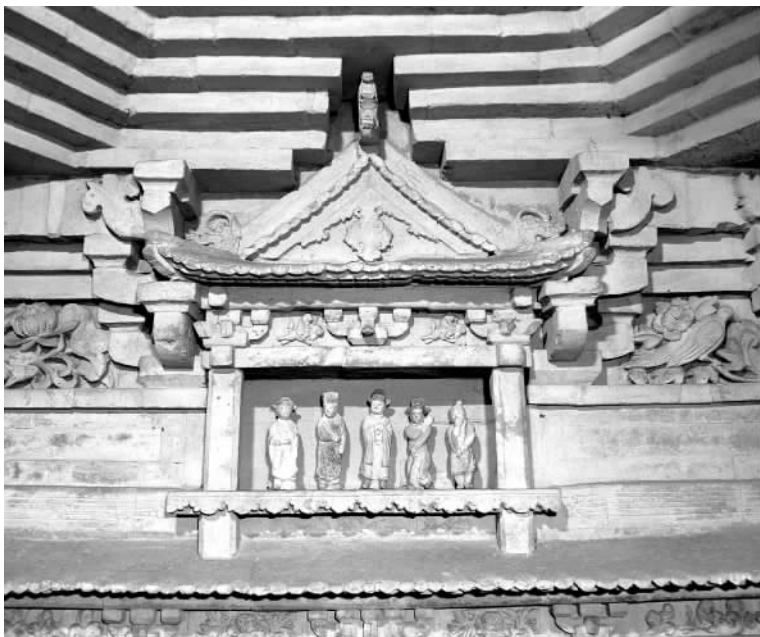
赵氏孤儿的故事是元代戏曲家纪君祥编写的,原名《赵氏孤儿大报仇》,又名《冤报冤赵氏孤儿》。那孤儿就是赵武,导致赵武成为孤儿的是“下宫之役”的结果。关于此役发生的年代,《左传》、《史记·赵世家》记为景公十七年,《史记·韩世家》记为景公三年。要按真实性较高的《左传》而言,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古称新田的侯马市。晋国将国都迁于新田的文献记载只有《左传·成公六年》一处:“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将新中军,且为仆大夫。公揖而入。献子从。公立于寝庭,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觐。易觐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膹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浹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这一年为公元前 585 年。两年后,《左传·成公八年》又记录了“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祿。夫岂无辟王,赖

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这一年正是景公十七年。

不管《史记·赵世家》怎么样记载屠岸贾为灵公宠臣,到景公时为司寇,景公十七年在没有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及其家族,还是较《左传》多出的公孙杵臼和程婴怎么救赵氏孤儿赵武,包括韩厥设法在景公面前美言恢复官职田地,其中的传说成分都与历史事实有很大的距离,起因都是赵盾与灵公的恩怨。宋朝人洪迈《容斋随笔》里讲,“(程)婴、(公孙)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我们在欣赏戏曲《赵氏孤儿》的同时,想到现代考古学让我们清楚了故事的发生地点即春秋晚期晋国新田(今侯马),至于故事情节共鸣与否,那是个人感悟方面的事了。

## 二

1959 年 1 月在侯马牛村南发现的金大安二年(1210 年)仿木结构砖雕墓,由墓道、墓门及墓室三部分组成,墓的主人为董明。墓道向南作阶梯状,墓门在墓室正南面,门洞置能随意开关的板门一合。墓室平面呈正方形,墓室四壁为仿木结构外檐形式,底部砌须弥式基座,四角有抹倚柱,柱头砌斗拱,墓顶砌八角藻井,雕八仙人物,祥云仙鹤,总高 4.2 米。墓室总体形制为“四合院”形式,四壁满施图案,雕有各式人物、鸟兽、花卉。特别是北壁砌堂屋三间、墓主夫妇面带笑容、手持念珠、经卷,对坐厅前,左右倚柱上分别雕着侍童、侍女。尤为突出的在北壁上部有一砖戏台,宽 60 厘米,高 80 厘米,进深 20 厘米,戏台有五个砖雕彩绘戏俑,自左至右分别是装孤、副末、末泥、引戏、副净。是金代后期院本和杂剧的演出形式,反映出 13 世纪初侯马地区戏剧繁荣普及的情景。这一墓室当年迁移复原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院内。同一地点还有 1959 年发掘的居于董明墓右上侧的董妃竖墓,和董明墓大同小异,也有砖



金代董明墓戏俑砖雕

砌舞台模型,5个戏俑正在进行演出。在董明墓右上方约25米处又有1965年发掘的104号墓,墓主人夫妇形象、立屏雕饰、两个戏俑与董妃竖墓相同,所不同的是舞台在门廊上方。牛村发现的五座金墓就有三座(董明、董妃竖、104墓)有舞台及四个或五个戏俑,足见这一时期这一地区戏曲艺术的繁荣。

1961年1月6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先生专程到董明墓参观,即兴题诗一首:“大金有优谏,歌台竟如画。不缘新建设,何以见风雅。”落款用行书小楷补写“一九六一年一月六日访侯马,得见金墓舞台真迹,同行诸友无不快慰,工作站功绩极可感谢。田汉”。上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曾以“八百年前一台戏”为标题拍摄董明墓,并反复播放。

1995年,晋光制药厂也发现了一座金大安二年



金代张氏墓墓志

(1210年)的仿木结构砖雕墓,在南壁偏西部辟一墓门,东部嵌雕戏俑、狮、窗扇及灯擎。戏曲俑位于相向的两狮间,五俑自左至右所扮角色分别为副末、副净、旦、装孤及末泥等。

更为难得的是,2000年在山西省侯马第二水文勘察院发现的金承安五年(1200年)田福茂妻张氏墓(杨及耘、高青山《侯马二水M4发现墨笔题书的墓志和三篇诸宫调词曲》,《中华戏曲》第二十九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6月),在涂白灰的北壁上有“南吕·瑶台月”、“般涉·沁园春”、“道宫·解红”三支诸宫调的曲子。根据这一新材料,2003年6月戏曲史家延保全先生撰写的《侯马二水M4三

支金代墨书残曲释疑》发表在《中华戏曲》第二十九辑;2004年12月另一位戏曲史家宁希元先生的《早期诸宫调歌词的重大发现》发表在《中华戏曲》总第三十一辑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戏曲史的深入研究。“汴京地区的杂剧艺人将杂剧艺术带到河东。但杂剧在平阳地区形成后,脱离了戏曲艺术为大都市、上层人服务的不良状态,转向与全社会、最广大群众相结合,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参军戏’停滞的处境,进而发展到宋、金杂剧。”(田建文《“善戏养神”与马村砖雕墓》(《中华戏曲》32期,2005年8月),表演艺术也由说唱体转变为代言体,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已经由滥觞期到成熟期的飞跃。

### 三

说到中国戏曲史,不能不说至今仍盛演不衰的《西厢记》。这要归功于根据唐元稹的《莺莺传》创作长篇讲唱文学《西厢记诸宫调》世称《董西厢》的董解元。但长期以来董解元的生卒年、月、字、号、籍贯均不详。只是元代钟嗣成《录鬼簿》上有这样的记载,“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直到196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游国恩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明(代)汤显祖评本《董西厢》说他名朗。”才解决了他的名字问题。

中国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唯一健在的弟子、现在已经九十五岁的姚奠中先生所著《董解元和〈西厢

记诸宫调》考索》(《姚奠中讲习文集》第一卷“论学篇”,研究出版社,2006年8月)一文称:根据牛村砖雕墓中的地契,“大金国……泰和八年(1208)买地,大安二年(1210)葬”,泰和是金章宗(完颜璟)年号,大安是金废帝年号,可见董明、董朗都生活在金章宗时期;“董明、董朗,明、朗皆从月旁,似属同辈兄弟”。结合侯马、襄汾、稷山等地砖雕墓中出土大量戏曲类文物,“如果董朗是董明的兄弟行,在金章宗这个‘知音’的皇帝的影响下,在侯马、稷山、襄汾相去不过百十里的范围内,散乐戏曲演出如此繁盛普及的环境中,创作出伟大的《西厢记诸宫调》是毫不奇怪的。”

当然,董明、董朗似属同辈兄弟的说法还只是姚奠中先生考证后的推测,下一步就要靠我们钩稽董氏谱系来证实了。古代有“董”姓,《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鬲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龙多归之,服事帝舜,赐之姓曰董。”春秋时期有个“董”国,闻喜县东北有“董泽”,董国应该在其附近。《左

传·文公六年》:“晋改菟于董。”杜解:“河东汾阴县有董亭”;《水经注·涑水》“又西过周阳邑南”条,注:“涑水西迳董泽,东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菟于董泽,即斯泽也”;《水经注·河水》“河水自河北城南,东迳芮城”条,引《汲冢竹书纪年》曰“晋武公元年尚一军,芮伯乘京,荀人、董伯皆叛。”董国后来被晋国灭掉了,晋国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董狐。曲沃县有“北董”村,侯马市的北西庄清光绪六年、民国17年的《曲沃县志》都显示名“西北董”村,《侯马市志》记载,“传说曲沃县有北董村,很早以前有一董姓人家西迁于此,为别于北董村,故名西北董村。”今白店、牛村、汾上均有董姓。不能排除董明、董朗与之同出一门的可能。

假如果这一推测可以成立,就更有有力地说明侯马市是产生戏曲家的摇篮和蕴藏着丰富戏曲故事素材之地。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侯马市文物局)

(上接 27 页)

态放松。上下相对的是以三片忍冬叶作为装饰,其中的两片弯卷,并以中间的一片为对称轴相互对称,叶片较瘦窄。现存的四个完整的圆环内,忍冬纹的用色、排列上大致有一定的规律并稍变化。联珠装饰的龟背纹连接处,下面都衬托着圆环,在联珠状龟背纹和圆环的外围空处,也以忍冬纹填充。

以上三种形式是笔者对忍冬纹型、式的一些粗浅分类。忍冬纹是北朝时期的重要外来纹样之一,其结构明晰,变化多样,极具形式美感。忍冬纹丰富的形态变化都与当时的文化背景相联系,在这种纹样的衍变的过程中,处处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理念的变迁。人们从忍冬纹中寻找美好的理想,对忍冬纹加以总结、变化来表现心灵的品性。

#### 参考文献

1. 薄小莹《敦煌莫高窟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装饰图案》,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2. 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4月。
3. 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三)》,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4月。
4. 倪建林《中国佛教装饰》,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8月。
5. 欧阳琳、史苇湘、史敦宇《敦煌图案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12月。
6. 敦煌研究院主编《石窟全集13·图案卷(上)》,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工作单位:太原科技大学艺术系)